读史札记

# 崔述治学的文化环境

刘文英

清代乾嘉时期杰出的历史考据家崔述，其学不显于当世。平生不仅官场失意，在考据学风正盛的状况下与众多学界名流也极少交往，其治学境遇甚至比不上批评考据学风、专攻史学理论的章学诚。但崔述终能取得独树一帜的学术业绩，著述大部分流传到今日，纠其情由，不能不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上予以分析。而学者所面对的大的治学环境与小的治学环境，乃是其人学术研讨成败、著作能否流传的重要条件。

## 一、考据学家崔述的学术特色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直隶大名府魏县（今河北魏县）人。他曾积极应付科举，但最终未中进士，五十七岁时官至福建罗源县知县，后借故辞官，专心于学术。他一生辛勤著述，治学不随风气，独辟蹊径，“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①]这些著述现均被收录到顾颉刚先生编订的《崔东壁遗书》中。

崔述作为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在乾嘉历史考据学家中独树一帜。他的历史考据秉持“考而后信”的宗旨，以疑古为治学风格，“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②]对古史记载，多从不可信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古史”离后世愈远，其附会、杜撰的成分就愈多。他指出：“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自称“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③]其《考信录》对先秦历史事迹与战国、秦汉间记载的上古、夏、商、周及孔子、孟子的相关事迹进行了全面考辨，“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咸辟其谬而删削之”[④]，表现出强烈的疑古学风。崔述对《史记》等史书记述的黄帝等上古帝王，一概存疑或否定，并且剖析其种种怪诞之说，对夏、商、周三代之事同样加以考辨，得出许多深刻见解，如商汤原非夏朝之臣、周文王非商纣之臣等。对郑玄至朱熹等历代学者的解经述古之说，崔述多所指摘，论辨明晰，理据充分。还特别对孔子及其学生的历史记载进行了细致清理，辨析《史记·孔子世家》的诸多舛误，指出《论语》亦有为后人掺入之处，认为孔子学生仅 70余人而已，“弟子三千”乃后人的夸大，被司马迁记载而讹传于世。崔述对《古文尚书》的真伪源流也进行了缜密的考辨，这表现出崔述的求实学风。但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崔述信仰儒学经典，并将之作为疑古考信的依据。

[收稿日期] 2010-01-15
[作者简介] 刘文英（1981—），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 二、崔述成学的文化环境

崔述学术成就的取得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包含整个学术界的大环境，以及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小环境。崔述成学的大环境不利，但小环境却很好，得到了亲友的支持与鼓励、恩师朱煐的教育与赏识、弟子陈履和的追随与无私奉献等。

### （一）崔述学术研究的大环境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逐渐兴盛，并成为学术主流。崔述生活于此时，其学术研究的旨趣在于疑古辨伪，但这种“疑古”的特色却不入考据学风的主流，不被当时考据学者重视，甚至遭到学术界的排斥。他自己叙述了这种变化：“初，余幼，学为时文，应童子试，时县人争誉之。其后与弟同入学，岁试常在前列，同郡人亦争誉之……四十以后，为《考信录》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⑤]这说明，随着崔述学术研究的深入，越是疑古，越是遭到冷遇。于是他自己提问道：“是何学愈浅则称之者愈多，学益进则愿观之者益少哉！”同时感叹道：“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虽然，君子当尽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间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于怠惰而不一言，以负天地而负父母乎！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⑥]这体现出崔述的怀疑精神与当时的考据学派格格不入，清代学者唐鉴甚至发出指责：“先生学主见闻，勇于自信，虽有考证，而纵横轩轾、任意而为者亦复不少，况其间得者，又强半为昔贤所已言乎。”[⑦]

清代考据以信古为主要倾向，主张不轻易否定古人之说。钱大昕说：“世之考古者，……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曜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⑧]当时大多数考据学家也持“护惜古人”的主张，尤其信奉汉代古文学派的治学成果，故清代考据学派往往被称作“汉学”。然而崔述的疑古之学正好与之相悖，大力抨击汉儒，于是更加遭到当时学术大环境的冷遇和排斥，长期未能彰显于世。

### （二）崔述学术研究的小环境

#### 1、亲友的支持与鼓励

崔述之父崔元森（1709—1771），字灿若，号暗斋，治朱子之学。崔述上有一兄，十一岁时夭折，令崔元森十分痛心，故对崔述宠爱有加，重视对他的教育，要求崔述读书达到“极熟”的程度，“十余岁时，每夕侍寝，必令背诵旧所读书若文。旦醒后亦如是”[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悉心指导对崔述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崔述之母李氏（1706—1780）对子女特别慈爱，也很注重对崔述的教育。在崔述六岁时，其母口授《大学》、《中庸》，使其成诵。崔元森如果有事外出，李氏就令崔述在内室读书，不令他与馆中其他儿童接近。“由是述等不在父侧，则在母侧，市井之言罕接于耳，游荡之行不经于目。”[⑩]因此，崔述在少年时没有受到环境的不良影响，这对他一生的行为起到有利作用。

崔述之妻成静兰（1740—1814），字纫秋，出生于官宦门第的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著有诗集《绣馀吟》和《爨馀吟》，合称《二馀集》。许多诗作体现出成静兰对崔述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使得崔述的学术研究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赠君子》一诗即为其中一篇：

> 崔郎卓荦志不群，胸藏经济人莫闻。有时慷慨论时务，沛如黄河向东注。近来学古益成癖，独坐搔首常寂寂，唤之不应如木石。忽然绝叫起狂喜，数千余言齐落纸。“五行”“三正”细剖分，创论惊天思入云。直欲扫除千载惑，岂效小儿弄笔墨。半生辛苦文几篇，才高可惜无人识。长安虽去每空还，十年憔悴长途间；且同煮酒开心颜。一朝飞腾遂厥志，平尽人间不平事。[⑪]

此诗生动形象的描述了崔述治学时的专注之态，并反映出成静兰对崔述的鼓励与信任，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和安慰。此时崔述还未放弃对功名的追求，但已经痴迷于学术的探讨。顾颉刚说：“东壁处境虽至坎坷，犹得嘶嘶一编，终成其学，是必闺房敬爱之情，足以

调和其生活，而消释其牢愁，乃有以致此。”[⑫]崔述能够得到其妻的理解，可谓十分幸运。

崔述之弟崔迈（1743—1781），字德皋，“聪敏异常。少常与兄述读木华《海赋》，述未及半而迈已成诵”[⑬]。二十岁又与兄同榜中举人。崔迈在学术上能够独立思考，“天性孝友，经术湛深，长于考据，与兄东壁齐名，人称‘二凤’。”[⑭]著作有《讷媞笔谈》、《古文尚书考》、《尚友堂文集》、《寸心知诗集》、《梓乡文献》等。崔迈与其兄在学术上有相近之处，兄弟二人在《尚书》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各自撰有《尚书辨伪》，前清大名举人范廉泉说：“这两部书的内容，大致是相同的；惟德皋之书，在量数上却倍于东壁的那一部。”[⑮]可见崔迈的学术研究，同样有疑古倾向而颇有见识。惜其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九岁。

崔述一门都能作诗，其妹崔幼兰，字绿芬，喜欢吟诗，并著有诗集，效仿其嫂成静兰之《绣馀吟》，取名《针馀吟》。总之，崔述的妻子成静兰、弟弟崔迈、妹妹崔幼兰都是知识分子，并皆有诗文集传世。亲友的支持、鼓励与相互切磋，对崔述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文化小环境。

**2.** 恩师朱煐的教育与赏识

崔述的恩师是朱煐（1699—1774）。朱煐，字临川，号龙坡，云南石屏人。雍正二年（1724）中进士，历任直隶赤城县知县、怀安知县、任邱知县、赵州直隶州知州、广平府同知、大名府知府、永州府知府。朱煐居官多年，“所至有惠政，简静廉平，畿辅称最。尤培植士类，振拔寒畯”[⑯]。乾隆十九年（1754），崔述与崔迈同到大名府应童子试，朱煐赏识两人的学业，考毕发榜后，崔述得秀才第一名，崔迈亦名列前茅。第二年就被召到府衙署内晚香堂，与朱煐之子朱士琬（字松田）一同读书，且曾得朱煐亲自任教为师。崔述在此读书八年，得益甚多。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十一岁的崔述与弟迈应顺天府乡试，同中副榜。

朱煐对崔述的教育与赏识，是促使其成才的有利因素，是其日后学术有所成就的小环境之一。崔述一生感戴朱煐师恩，铭记难忘，他曾回忆说：“余家故贫，薄产无几。自漳水入城后，资用悉沉于水，益贫困不可度。公嘱魏县知县王公沛生，延先君入义学训士，饘粥始给。而余自入署后，非但从公学举业，且得纵观海内之书，交游天下之士，以扩其耳目而开其知识。向使余不遇公，即不穷饿以死，亦不过为乡人以终其身，何由能著此书！然则《考信录》之作由于公之玉成者不少也。”[⑰]从这些材料上可见，恩师朱煐先是聘请崔述的父亲任教职，后又令崔述在官署内受业，在生活和学问上照顾和提携崔述，对他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3.** 弟子陈履和的追随与奉献

崔述的弟子，屈指可数，今可知者四人：张自新、黄文治、边印金、陈履和，他们都深知师术。前三人事迹无多，对崔述学术事业贡献最大的是陈履和。作为崔述的弟子，他为恩师的学术著述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陈履和（1761—1825），字介存，一字海楼，云南石屏人，举人，与崔述之师朱煐是同乡。他少年时就在家乡听到朱瑛讲过赏识崔述才华的话，又看到崔述给朱煐写的墓志，于是对崔述非常仰慕。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十三岁的崔述在北京待选时，遇到在北京参加会试的陈履和。陈履和“嗜学好古，所为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误”[⑱]，通过向崔述索书，“得读《洙泗》、《补上古》两录，和《三正》、《旻祀》两通考”，读后极为崇拜其学识，并写信说：“旬月以来，捧读大著，辨古书之真伪，折群言之是非，期于尊经明道，无所淆乱而后已，比于武事，可谓敌忾御侮之师。虽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发蒙，略辨黑白，生平谒见所及，一人而已。”[⑲]于是，决定拜其为师，崔述“乃辞之者屡。而介存意坚不可移”[⑳]，遂结为师徒。在京师仅相聚两个多月，陈履和却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将传播恩师的学说作为一生最大的愿望，他将其学力、财力、精力大都投入到刻印崔述《考信录》之中。

乾隆六十年（1795），陈履和的父亲陈万里中进士，嘉庆二年（1797）被任命为江西丰县知县。陈履和随从其父在官署，当年就刊刻手头所有的崔述著述四种。后陈履和致信崔述，言其刊刻著述事，崔述回信表示书稿未

定，还要修改，但陈履和表示：“履和质劣心乱，不能读先生之书，窃欲使天下能读之士皆得受而读之。”[21]此后，陈履和再致信崔述：“得读老夫子大人先后来书，谆谆以刻书为过举。……既又念先生之书即果有一二条未定处，而使海内承学之士相与考订而商论之，未始非先生之所愿也。”[22]并且向老师搜求著述，表示以后修改也无妨，将来再重新刻印。由此可知，陈履和为刻印恩师的著述、传播恩师的学问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片赤诚之心为后人所称颂。

嘉庆二十年（1815），崔述自定全集 88 卷，作遗嘱，令保存书稿于家，等陈履和来取。次年二月逝世，享年 77岁。六月，陈履和来探望，取遗书，并入京临选，任山西太古县令。在县令任上，仍坚持刻印崔述的遗著，八年之后基本刻竣。至道光五年，陈履和卒于浙江东阳县任上，死后“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一子甫五龄，并无以为归计”[23]，家属都已经无盘费归乡。此情感动了署金华府知府萧元桂，他与陈履和之弟商量将几十大箱的崔述著述书版留存于官署，并与金华各县知县协商募捐，作为刻书之资，交陈履和家属用以归乡。可见陈履和是用自己的钱作为刻印恩师之书的费用，还背上了债务。这才使得崔述的学术得以流传于后世。清道光进士张维屏在《松轩随笔》中说：“凡先生所著书，履和一人刊行之。先生之书不朽，履和为弟子，其笃于师弟之谊若此，亦当附之以不朽矣。”[24]崔述的著作不至于淹没而传世，且终于在近代中国与世界备受推重，彰显天下，这首先应当归功于陈履和。著名学者胡适曾赞扬说：“崔述与陈履和相聚只有两个多月，以后他们就没有见面了。两月余的相逢，发生了三十多年的相敬爱，成就了百余年的学术渊源：这一段很美的故事是很能使后世读者感动怀念的。”[25]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洪业说：“崔东壁竭四十年之力以著书，稿必屡改而后定。陈介存竭一生之力，罄一家之财，以为其师刻书，前后创刻、重刻、修刻，而未竟其志以死，盖学术史中仅见之事。”[26]陈履和对崔述遗书的刻印可谓呕心沥血，其事迹乃是感人肺腑的千古佳话。

总之，崔述生活于清乾嘉时期，其学术敢于疑古，当时整个学术大环境对其学术研究是不利的，但是，却有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包括恩师朱煐帮助他在府署研读八年，使他在学术上有所精进；亲友对他的照顾和支持，使他有一个学术味很浓的家庭氛围；弟子陈履和辛苦二十余年，帮他刻印遗书，使之留存于世。胡适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中说：“崔述少年时遇朱煐，得他的帮助，方才有读书的机会；晚年时遇陈履和，结师弟之谊，履和牺牲一切，替他刊刻遗书，他的著作始得保存于世。这两个人都是云南的南部石屏州人，离大名县万余里：这真可算是一段遇合奇缘了！”[27]在良好的小环境的支持下，崔述得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下去，著述得以刊刻，终于在百年之后名声彰显。

## 三、崔述治学境遇对学术史研究的启示

学者治学，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而就个体角度来看，每个学者即使处于同一时代，其治学的大、小文化环境也不尽相同，甚而差距巨大。学者个人的治学环境，实际是其社会地位、人脉关系、家世背景、本人学术特点与当时社会学风等等因素相互纠合的综合体现。中国古代学术史与史学史的研究，应当加强对重要史家所处大、小治学环境的研究。

以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三大思想家为例，他们皆恪守遗民身份，一生不仕清朝，大致处于相似的宏观社会背景之下，然而王夫之与黄、顾二人的治学环境大相径庭。黄、顾二人讲学、游学，弟子众多，著述流行，学术名声当时即显赫于世，且与清朝为官的文人、学者结交甚广，甚至晚辈戚属即为清朝达官。对于清廷办理之事如纂修《明史》，也予以一定程度的参与、合作。因此黄宗羲、顾炎武治学的大、小环境，均属良好，基于精心探讨，取得学术成就与著作传世，皆若顺水行舟。王夫之则拒不剃发，避入深山，潜心著述，只有家人及不多的学生与之接触，生活也需学生辈接济与照顾。但王夫之以坚韧的治学毅力，撰写了大量

学术著作，思想认识水平达于时代巅峰，却不显于当世，生前仅刻印诗集一种，后仍佚失。幸而子孙后代敬谨保存其著述，陆续有所刻印，使王夫之学术渐为人知，至清同治年间，经曾国藩兄弟对王氏著述的广行搜集、着力表彰，刻印《船山遗书》行世，方声名大显。对比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治学的有利条件只有一个很狭小的文化环境，全凭超乎寻常的学术意志和精密深湛的思考来弥补条件的不足，取得丰硕成果。但著述是否可以传世，仍颇具风险，有待于大环境的嬗变。因此，虽然都是以明朝遗民自居，黄宗羲、顾炎武经营了一个较大空间的文化环境，而王夫之则自安于在很小的文化环境内刻苦治学。

至乾嘉时期，清朝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学者治学的大、小文化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具有新的特点而已。将崔述的治学历程与同时代的章学诚予以对比，更能够将学者所处文化环境的问题明晰地展现出来，对于史学学术史的研讨具有启示作用。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理论家，同时在方志学、目录学(校雠学）理论上颇有创树。撰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等，所谓“通义”，是属于理论性层次的问题，其治学特点在于作理论探讨，而不善于具体史事的细致考证，这与当时强劲的考据学风似乎格格不入。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从胡适、姚名达撰著、订补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可以看到，章氏不仅得到朱筠、梁国治、毕沅等达官显宦的赏识，也获得一般官员如冯廷丞、周震荣、裴振、陈奉兹等人的多种帮助和接济。章学诚考中进士，得自梁国治的选拔、提携，进士的功名和地位无疑给章氏提供了很大的文化活动空间。章氏与钱大昕、王念孙、邵晋涵等学界名流多有交游，其中与邵晋涵的友情尤深。由周震荣鼎力推动、毕沅聘用章学诚主持编纂《史籍考》，在当时就是引人注目的学术大事件。特别是一生多次被聘请纂修各地方志，乃章学诚得以在史学理论上有所创树的主要因素。[28]由此可见，乾嘉时期对于章学诚的学术研究而言，不是十分严重的逆境，胡适为章氏“抱不平”说：“那班‘擘[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29]这讲得有些言过其实，而移用来描述崔述的境遇，倒比较贴切。

崔述仅仅中举，而会试中屡屡落榜，这一点上已经逊色于章学诚。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既不像章学诚及许多学者那样在官员门下做幕宾，也不谋求纂修方志之类的社会文化活动，不结交学界名流与时贤。加之治学的疑古考据宗旨，所受冷遇和排斥远远大于不搞考据的章氏。对于自己著述“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的感叹，固然表达了坚定治学的决心，但同时也放弃了在治学环境改善上的经营。有陈履和做出刊刻全部著述的无私奉献，实乃万幸，但即使如此，百年间的埋没无闻，也远比章学诚严重，没有近代思想文化的全面转型，崔述学术思想的价值和意义，是很难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直到 1903 年，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才发现了崔述的著作，将陈履和刻本进行整理、排印，在日本“始渐知其可注意”[30]。随后，刘师培、胡适等人开始撰写文章，介绍崔述生平及著作，他在古史辨伪方面的贡献逐渐传布于中国学界。顾颉刚自 20世纪 20年代至 80年代，投入颇大精力和功力，搜集、整理和补订出版《崔东壁遗书》，收入所有可资研究参考的相关资料，对其学术思想热烈地予以阐扬、表彰，方使崔述立于清代第一流大学者之林。通过研讨崔述治学成就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启示:

第一，学者之成学，必然有其相应的大文化环境及小文化环境。探析重要学者所处的大、小文化环境，应当作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这种研究应当深入、具体，细致考察特定学者个人所处的大小不同范围的文化环境。

第二，学术事业是社会文化的精粹部分，具有顽强的发展潜力。学者的真才实学、优秀撰著，即使一时不能获得良好的宏观文化环境，也往往可以构建出一个较小的支撑环境，使之终有成就，以待时遇，如史学家崔述等学者的事例。

第三，历史上确实也有一些学者，专心治学，成就卓然，但不善于或不屑于经营与扩展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于是虽有著述留存，但仍被埋没、尘封。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应当予以发微阐幽，使之显见于世，特别是对于民间从事偏僻学术门类研究而确有成就者，要投入人力做深入调查。崔述的史学成就在近代被中日史学家所发现、表彰，从而彪炳于清代史学史，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

①《清史稿》卷 482，《儒林三·崔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②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载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后同。第 5页。

③同上书，第 7、8页。

④《考信录自序》，载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921页。

⑤《考信附录》卷之二，《书考信录后》，见顾颉刚《崔东壁遗书》，第 487页。

⑥同上书，第 487—488页。

⑦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 14，《经学学案》。山东友谊书社 1990年版。

⑧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

⑨《考信附录》卷之一，《先君教述读书法》，载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470页。

⑩同上书，第 470页。

⑪成静兰：《二馀集·爨馀吟》，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784页。

⑫顾颉刚：《二馀集·案语》，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781页。

⑬乾隆《大名县志》卷 36，《乡贤传》，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⑭杨荫涖：《寸心知诗集附录·崔德皋先生传》，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907页，第 908页。

⑮姚晋檠：《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致顾颉刚先生书》，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1038页。

⑯袁嘉谷：《石屏县志》卷 10，《人物志·官迹》。民国二七年排印本。

⑰《考信录附录》卷之一，《少年遇合记略》，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473页。

⑱《考信录附录》卷之一，《附录·赠陈履和序》，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477页。

⑲《考信录附录》卷之二，《附陈履和刻书始末·客京师时致书》，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481页。

⑳《考信录附录》卷之二，《附陈履和刻书始末·送别诗四首》，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482页。

㉑胡适：《崔述的年谱下》，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995页。

㉒同上书，第 996页。

㉓萧元桂：《〈崔东壁先生遗书〉序》，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924页。

㉔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卷 35，第 960页。

㉕胡适：《崔述的年谱上》，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962页。

㉖洪业：《崔东壁书版本表》，见顾颉刚《崔东壁遗书》第 931页。

㉗胡适：《崔述的年谱上》，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962页。

㉘见乔治忠：《章学诚的史学创见与修志实践的关系》，《南开学报》1988年第 4期，第 78—79页。

㉙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胡序》，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 1页。

㉚赵贞信：《考信录解题·附记》，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第 930页。